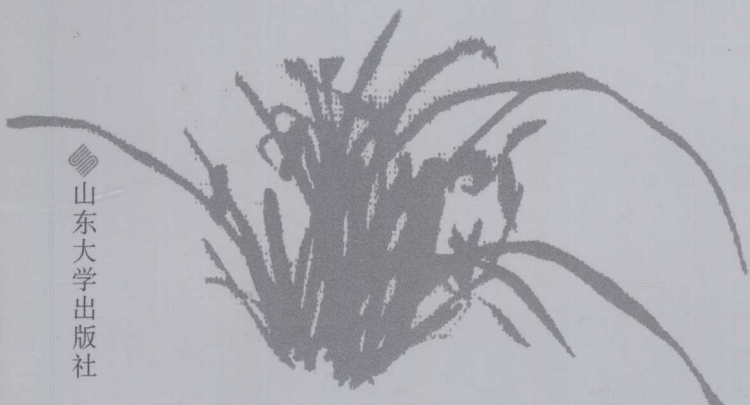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重构对话

孔范今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重构对话

孔范今 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构对话/孔范今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5

(望岳文库)

ISBN 978-7-5607-3857-4

I. 重…

II. 孔…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01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铁路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875 印张 296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189)	……	……	……
(193)	……	……	……
(194)	……	……	……

* * *

(202)	……	……	……
(203)	……	……	……

目 录

新时期文学的数度突围与选择	……	(1)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	(6)
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次冲刺	……	(29)
治史者的角色定位	……	(50)
历史现代转型中的文学潮涌	……	(189)
——20世纪中国文学回望	……	(53)
对视,并不是取其反	……	(60)
绝对化思维无助于文学史的科学建构	……	(62)
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启示	……	(70)
——重读石评梅	……	(69)
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	……	(88)
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	……	(117)
《孔范今自选集》前言	……	(140)
《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总序	……	(153)
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阈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	……	(201)

《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后记·····	(231)
我看新时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233)
重识现实主义·····	(241)

* * *

关于“现时代的媒体与主体”的对话·····	(250)
关于“史识与批判精神的匮乏”的对话·····	(255)
姿态的前卫与观念的滞后	

(1) ——关于近年文学批评关键症结的对话·····	(260)
关于人文魅性与现当代小说的对话·····	(266)

* * *

《报告文学经纬》序·····	(277)
《新时期文学综论》序·····	(281)
《世纪末夜晚的手写》序·····	(285)
《翻阅生命》序·····	(289)
《砚边絮语》序·····	(293)
《新编详注唐诗三百首》序·····	(295)
《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诤》序·····	(299)
《爱与痛惜》跋·····	(305)
《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序·····	(307)
《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序·····	(311)
《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序·····	(315)

《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序·····	(321)
《中国现当代作家新论》序·····	(329)
《现当代文艺创作中的怨妇母题》序·····	(333)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序·····	(338)
《现代出版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序·····	(344)
《现代人文视野中的乡土体验与文学想象——师陀创作论》序 ·····	(349)
《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说》序 ·····	(353)
《走向中和》序·····	(360)
后 记·····	(369)

新时期文学的数度突围与选择

在当代文学的 50 年中,就既有价值观念的深刻性调整和几近芜杂的蓬勃生力而言,还是当推新时期文学最为引人注目。

或者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在这 50 年中,如果以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为界,这之前之后的两个阶段,实质上走的是不同的路向。前者是“现代”时段中以延安文学为核心的解放区文学的直接赅续与发展。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解放区文学以不争的资格入主北京,并迅即以借助于政治的巨大统摄力改造了原国统区的作家及其与之不无区别的文学观念,只在数年内就完成了文学与文化上的大一统。此后,便是在不断强化的政治统摄中走着愈来愈严整的规范化道路,而且在极“左”思潮的推涌下一步步逼近极端,走入绝路。而后者新时期文学则不同,它是在开放性、更新性的历史语境中,以高频率的动作左冲右突,在短短 20 年中历经数度突围与游走,终至于 90 年代所呈现的在政治、文化、艺术各方面全面失范的状态。颠覆这样那样的既定规范,大约可以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谋取自身解放的一种基本方式。

如果我们不再泥守于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等从题材内容或思想文化表征上对新时期文学的时空切割,而是把握一下这段文学基本性价值选

择的内在脉动,就可以发现,无论它们表现得如何众声喧哗,如何杂乱无序,但其历史的脉络还是有迹可寻的。就我的感觉,在这20年中,似乎曾发生过4次潮涌,即4次突围,尽管彼此互有交错,但并不能简单地一刀断开。

第一次当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前期。当时席卷整个文坛的人道主义思潮,激活了整个文坛的活力和批评界的激情。这时,大家以并不陌生的文学认知和文化激情,仿佛穿越了数十年的无奈,终于又和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重新恢复了充满希望的衔接。这次突围,冲击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严重政治化了的文化与文学格局,创作界与批评界对理直气壮承认包括自然人性在内的“人性”合理性的齐声呐喊,对“人”的权利的合力张扬,确实是声势磅礴,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未有。大家为重新找到解决文学与历史问题的症结点而备受鼓舞,多年的迷惘与积郁得以澄明与宣泄,似乎到这时,文学已从奴仆又复归到了主人的位置,代表着文学也代表着历史向社会公众作正义的言说。就创作而言,一方面是对时至今日,却仍与世界性文明和中国现代性提倡表现为巨大逆差的人性生存之黑暗现实的揭露与鞭挞,不仅让人们看到在那“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发生的令人瞠目的人性悲剧,而且不无夸张地凸现出类似以一根绳子吊死五个女人的并非个例的愚昧与无奈。这次带有鲜明启蒙主义色彩的文学大潮,无疑构成了20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又一亮点。而与五四启蒙文学不同,它不再只是专注于对传统性文化的责任追究,而是将它与极“左”政治的历史发展进行着互为因果的一体化批判,使之从对现实的关注到对历史的反思性回溯演成了必然性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将富有“个性”色彩的英雄设置于被寄予希望的改革现实之中,一厢情愿地演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花园街五号》等一出出张扬个性的当代英雄的壮剧。与这时的文学创作相呼应,文学批评界所使用的词语,诸如“人性”与“人性的冲突”,“历史感”与“历史的深度”等,

自然也成了文学价值的标志性语词。“人性”与历史的攀升、黏结,其结果必然是对历史的重新感受与读解。一反过去那种对历史的政治化的宏大解说,这时的文学以其干预现实和历史的勇气,开始以另一种笔墨向人们描绘着历史的真实面貌,把人性的剧烈冲突、家族的深刻纠葛、偶发性事件的琐细,一股脑儿地填充进了为人们已知的历史事件的宏大框架之中,意欲颠覆既定的历史价值判断,并让人性之旗理所当然地飘扬在历史建构的巨大时空之中。作家们自信,这不仅是文学的真实,而且也是历史的真实。而读者们阅读起来,虽不乏陌生与新奇之感,但终因沉睡经验的唤醒而服膺了它们饱含激情的真实性虚构。为这次突围作结的,应该是《古船》和似乎与它异类的《红高粱》等中长篇小说。当然,嗣后出现的《白鹿原》、《缙绅与决绝》等,也可以看作是对其一脉相承的发展。事实上,80年代末到90年代出现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小说,也是在这里就已经为之奠基或提供了启示的。

这次突围最基本的特征,是由其努力所实现着的“意义”置换。别看那时的创作与此前相比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但就文学观念来说,被作家们珍视的实际上依然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尤其在80年代初期,则更是如此。当时大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认为,此前政治对文学的异化,主要是改变了文学所应给予独特关注的“意义”及其与此相关的历史责任担当。因此,将政治说教置换为人性的全面启蒙,一时间成了文学创作最强烈的欲望。那时,为人们所着意超越的,只是政治性“现实主义”那种非文学性的意义内容及其程式化表现形式,而人们对于“五四”启蒙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心向往之的,所以,这时期可视为发生于当代的一次文艺复兴运动。

但这种人性的历史视角和传统的把握方式的局限性也于不久即被作家们感受到,与之相关的“意义”的确指和叙述者的“全知”

姿态与文学之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他们的感知中也已成为文学发展的严重束缚。于是,新时期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围,即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面引进和仿作。现代主义在文坛中心绽放出各种新异之花,在主流位置上消解了启蒙主义文学大潮,并形成一道炫目的风景,这是20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在现代时期,由于作为历史中心行为的启蒙只能转型过渡到社会政治革命这一新的历史中心环节,而对此无所作为的现代主义就只能在边缘区作短暂的停留,成为不时出现于天边的一抹彩云。而这时却不同了,对文学自身的趋新性追求,使现代主义入主文坛中心变成了现实。虽然这一阶段的各种试验并没有多少年的风光,但它们对于“意义”确指性的改写和对叙述主体“全知”性能力的怀疑,确实有效地保证了这一次文学突围的实现。

新时期文学的第三次突围即新写实主义的出现,肇始于80年代末,而于90年代初期成一时之盛。现代主义的试验虽然成就了一部分作家创作特色的形成并明显地浸润了整个文坛的创作,但是,中外历史条件的差异、文化心理的隔膜以及作家们无可改变的对写实主义的亲和态度,都决定了西式现代主义的难以恒久的命运。但当作家们再次重新关注更普遍意义上的人们的生存现实时,却没有重复传统现实主义的既有观念,而是把对“意义”和创作主体主观介入的双重消解,看作文学写实主义更新的必要前提。所以新写实主义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没有意义生成的众人生存的原生状态,二是作家情感的“零度介入”。在这类作品中,人物都是平庸生活中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生活也只是无数虽无意义却无法躲避的恼人琐事的堆积。这些人并没有主体张扬后的荒谬与孤寂,有的只是无法不平庸的无奈。这种作品打破了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所形成的一切现实主义成规,不仅更新了人们对文学阅读的传统性期待,而且对批评者的主体调整也提出了挑战。事实上,从对新写实主义文学的态度到对与之血脉相连的1996年新现实

主义的批评,都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批评者其前卫性的批评姿态与滞后性的文学观念之间的深刻矛盾。

新时期文学的第四次突围,那就是1996年的现实主义的潮涌和近几年活跃于文坛的“新生代”和“70年代作家群”了。文学和人生一样,都难以忍受长时间的沉闷与无奈,于是作家们在新写实主义难以再有拓进时,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向上开始了新的超越性努力。以河北“三驾马车”和刘醒龙、李佩甫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1996年制造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他们重又找回了作家的历史职责和人文情怀,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幅足以让人动容的艰难现实人生的图画。但终又因其难以克服的自我重复,而令人叹惋地销声匿迹于“新生代”的众声喧哗之中。与新写实主义不同,“新生代”尤其是“70年代作家群”,他们不仅拒绝“意义”,而且拒绝“众数”,将写众生的无奈变作了为其标榜的“个人化”写作。他们不再将创作主体隐蔽起来,而是把主体与人物合一,使作品内容也变作了作者个人隐私的描述。在既无历史责任的支撑又深受商品大潮影响的情况下,他们的所谓“个人化”写作,又势必成为连他们自己也不讳言的“欲望化写作”。“新生代”写作在对既定文学观念的冲击和营造新的文学天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将路子限定得那么窄,却又不能不让人为之忧虑。

新时期文学的每一次突围,都必然表现为一次新的游走与选择,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每次新的游走,也必定有得有失。新观念与误解并生,甚至于表现为每向真理性认识走近一步,却又同时远离了它几分。这种现象是愈到后来愈明显的。对此,不能不保持清醒的认识。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人之一，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他不仅以其意气勃发、文辞滂沱的文字鼓动起一代有识之士的改革思变之心，而且更以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启动了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然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并非与事实相符。

在几为定论的历史与文学研究中，谈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必自五四文学革命起，且必定置设于与此前的一切主张的对抗格局中运思。在这一格局对认识的框定中，梁启超很自然地就成了“改良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总属于“新”字号历史时期前的“旧派”，而非新历史进境中重要的“这一个”。因此，对他之于文学现代转型的作用与意义，在评价上总是划归于另一价值范畴中作低调解说。近年来，人们眼界大张，观念亦有较大调整，学界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既有的认识作解构性反思，对既成格局作突围性努力，已成为多数人共同的愿望。“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和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新史学建构的实践，适足说明了人们已有意于以“20 世纪”文学历史时空的开拓性确认，来走出原来的局面。但扩则扩矣，无奈因成见既深，一时又难以改

变固有的选取与评价的尺度。如《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①，虽属一部视野开阔的创辟之作，但在其列名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一编中，却是由“‘五四’‘革命文学’思潮”讲起的。至于梁启超的种种主张，虽然更富实质性的倡导多发生于20世纪之初，但却统统被纳入了19世纪。而对于新建构面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该书把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视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有些学者更是难以接受，立即著文予以质疑，坚持认为“中国真正的新文学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即以中国近世文学而论，在文艺思潮上起了巨大变化的，也不在1900年前后，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②有人还“进一步看问题”，指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说赞成与否，“两者之间根本性的分歧意见，其实在于是否承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其旗帜鲜明的倡导‘文学革命’（本质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③其实，在新的反思性建构中，即以拙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④而论，并没有表现出要否定五四文学革命伟大意义的企图，只不过是取了自以为更为客观的态度，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链条，把梁启超之“三界”革命与陈独秀之“文学革命”给以各安其位的梳理、整合而已。对此暂且不论。笔者倒是想向质疑者且发一问：为什么一些五四文学革命的亲历者对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态度反而与近世论者不同呢？不妨且举几例。如，钱玄同可谓在“文学革命”时态度最激烈者之一，可他在“文学改良”（注意：胡适旗帜初张，讲的也是

① 此书为陈伯海主编，东方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② 吴中杰：《世纪交替与文学史断限》，载1998年11月6日《文汇报》。

③ 朱文华：《也谈文学史断限》，载1998年11月20日《文汇报》。

④ 其时，率先出版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即为由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一部。该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6月出版。

“改良”，足见“文学革命”初倡时与历史思路的承接)、“文学革命”刚提出之时，旋即致信陈独秀云：“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①又如，郭沫若虽属情绪激烈而善变的人，但在回顾“文学革命”时却并未忘记梁启超，而且称赞他说“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虽然未能摆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地发挥尽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②。再如，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他也说梁氏之“新文体”，“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而且还指出：“打倒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按：指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③很显然，这些亲历者都在“现代文学之革新”的意义上热情肯定了梁启超的第一人与先导的作用，赞扬了他对其“个性”与“自由”的充分发挥。那么，为什么到了近几十年来，作为并非亲历者的后辈学者们，倒是另执一言，特别着意于强调本属同一转型过程的前后两段之间的异质性与对抗性呢？质而言之，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分依附于这几十年来对历史新作的政治分期，因此拘牵于以“旧民主主义”与

① 钱玄同：《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②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6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③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页。

“新民主主义”为界分的新谓“近代”与“现代”的历史判断,以致形成迄难有改的思维惯性,故而闻异而动,生怕错乱了被仍然奉为圭臬的“历史秩序”。这种担心非为治“现代文学”者所仅有,治“近代文学”的人也已给予密切关注了。据报道,1995年6月18日第五届上海近代文学研究者联谊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发言者倾向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甚明晰的概念,表面上看,这是现代文学研究视界前移的结果,实际上这一说法,“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向作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分别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显然会对(中国)文学进程的研究和阐述造成逻辑上的困难”^①。近代文学研究界出现这种反应的原因,与前者实出一辙,并无二致。

海外的研究自然有所不同,由费正清、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述到维新变法的失败时,表示了这样的见识:“但是维新运动绝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的规模的影响。”“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20世纪文化危机的序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

^① 刘诚:《第五届上海近代文学研究者联谊会在我校召开》,载《复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找思想的新方向。”^①这种见解无疑是十分精到的。对维新运动作用的考察,能够超越其失败与局限,看到由其所引发的历史运动的深化和历史阶段的转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慧眼独具的发现。但有一点又不能不令我们感到遗憾,那就是当其其对维新运动作如是观时,却没有发现恰恰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才使得“新的思想意识时代”的实现真正成为可能,即梁启超在其时所发挥的独到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忽略。证之于由费正清独立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则更足以见出此说不谬:“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1898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②可见,把1898年的改良运动及其在文化上的观念变动笼统视为一物,而与五四“新文化”思想运动分列、连缀,为其基本的认识。

由以上情况可知,海内外学者在评价该段历史时各有其见,也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的独特意义有所忽略,没有看到历史

^① 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382页。

^②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在这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因此,笔者认为,要正确评价梁启超及其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首要的一点,即是吹拂掉遮盖历史皱褶的烟尘,明察以维新变法的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梁启超之于历史的事实是,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东瀛,但却得了机会在一个在他看来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深刻的反思。他自陈:“既旅日数月,肆业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①而且说:“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②在日本的最初几年间,梁启超在学习与反思中观念大有改变,在政治与文化上都与原曾为其主帅的康有为发生了分歧,并走出了康有为的笼罩。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清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既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③其态度于此可见大概。

对于“新法”,以及此前的种种变革努力,梁启超皆作了痛心疾首的深刻反思,并从两个方面力陈其弊:

第一,没有抓住根本。他认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

①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卷4,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0页。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卷22,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6页。

③ 转引自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58页。